

《当代戏剧》五十华诞畅怀

杨文颀

《当代戏剧》与我，确有不解之缘。其刊初创(时名《陕西戏剧》)，我即是忠实读者，随即又断续投稿，连绵半个世纪。一些人和事，经久难忘，感念弥深。

上世纪60年代初，京剧名净于金奎应约加盟陕西省京剧团，以“裘(盛戎)派”名剧《姚期》亮相西安舞台，据我所知，于乃早年北京中华校校优等生，与曾经供职于陕西省京剧团的名小生储金鹏，名武生王金璐为同科师兄弟，都是艺术根底深厚的演艺人才，时“裘派”于西安，可以说尚处于空白状态，传媒因受科技条件限制，西安观众还无缘目睹“裘派”风采，裘盛戎先生本人也从未来西安献演，而愚当年在北京进修时，却有幸多次观赏裘盛戎先生的舞台风范，感触至深，五体投地，因而于的到来，也无形中对我有着强烈吸引力，往观之后，果然中规中矩，纯正稳练，颇具功力，这对向西安观众介绍传播“裘派”艺术，自是大有好处。巧合的是，时任职于《陕西戏剧》的负责人李育生先生，也出于对“裘派”艺术的心仪神往，亲自登门找我约稿，我不揣浅陋，遵命写了篇《〈姚期〉琐谈》，发表于他主持的《陕西戏剧动态》，这便给我提供了一次对“裘派”艺术表达倾慕情怀的难得机缘。其实在我学习写作之初，我们就有“文字缘”，时当上世纪50年代初，广大农民缴纳公粮的热情很高，车水马龙，通宵达旦，我即兴写道——“太阳红堂堂，群众送公粮”，育生先生当即问我：“群众送公粮，你倒是弄啥的吗？”我恍悟，遂改“群众”为“我们”，他欣然：“这就对咧！”当然这是一则笑谈，不过正说明我们亦师亦友，情谊长远。老头儿如今八十又七，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依然对我的笔撰多所关注并有所提示点拨。这老头儿有一大特点，平生低调含蓄，从不张扬，以至于他的许多才艺，并不大为人所知，他能司鼓，能拉板胡，还登台演过秦腔《苏武牧羊》，更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实在十分难得，所谓“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者是也。

另一位曾在《陕西戏剧》任职的老者，是戏曲美学家陈幼韩先生，记得有一次，他代表编辑部邀请西安文艺界有关人士，讨论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我亦在座

并有发言，还写了稿子，会后幼韩先生审阅认为意犹未尽，当即枉驾寒舍，要我再依发言内容补写，我为其热忱认真所感，连夜续写了三千字交付，他只字未改却别出心裁加了几个醒目的小标题，以《要着力刻画人物》全文刊出，我玩味良久，不由不悦服赞许。又有一次，我写了篇对秦腔骄子苏育民先生表演艺术的评论，幼韩先生阅后直截了当指出：“文章写的有内容，但后一部分有重复之感。”我再次依他所言作了推敲剪裁，我佩服他的才识，更佩服他的率直，我们由此成了“知友”。就在他离休后年逾古稀的1999年，我欲出版选编的《秦腔清谈》，请他为我“把关”，他慨然应诺，抱病审看了全书，并作了详细笔录，指出了诸多偏颇之处，以至于遣词用字、标点符号等等，使我得益良多。我深感，这样的刊物编辑，是难能可贵的。

作过《陕西戏剧》负责人的戏剧评论家金藏先生，也是我敬重的文友之一。一次我去编辑部取一篇退稿，临走时碰到他，他见我拿着稿件，便要过去稍事浏览，当即表示：“你先别拿走，我再看看。”不久这个稿子便刊出了。其实这只是个干把字的“小品”，本无足轻重，他竟然如此审慎，很令我感动，这反映出他作为编辑对作者尤其如我这等人微言轻者劳动的尊重。另一次，刊物发表了我一篇谈秦腔名丑王辅生《看女》的文章，他在西安市文化局召开的一个创作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加以褒扬，认为“言之有物，真切生动”。我觉得，作为主编这般坦率是少见的，对于作者当然是一种激励和引导。不久前，王辅生因病故去，老头儿活了83岁，前年我老母过世，他以81岁高龄还前往吊唁并参与演出，我自然深怀感激。他82岁过最后一个生日，我去祝贺，献词是：“艺苑寿星，丑行奇葩。”治丧时我的挽辞是：“菊坛耆宿，呜呼星沉。”《西安艺术》为了悼念他，还特意转载了我那篇20多年前的旧作(稍有调整)，按其编辑部主任韩健的说法：“这是评论王辅生表演艺术唯一的一篇。”这又使我欣慰之余不能不念及金藏老兄和《陕西戏剧》。

刊物更名为《当代戏剧》，这是改革开放后高平副

主编“新官上任”的“一把火”。他当过“右派”，平反后依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我写过一篇《秦腔流派问题思考》的稿子，他签发时改名为《创造流派当拼搏》，这约略可见他精神状态之一斑。接着，他又连续发了冠养厚先生和张静波先生的两篇长文，形成了关于秦腔个人艺术流派的冲击波，虽不能说是“一锤定音”，但至少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号。因为当时有人动不动鼓噪：“流派纷呈。”热闹倒是热闹，可惜离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个问题，或许今天仍有歧议，但二十多年前《当代戏剧》首先引发讨论，无疑在秦腔艺术史上是有意义的举动，足见高平先生的胆识和魄力。他调任编辑部前，还办了个小报《舞台与观众》，颇受读者欢迎，我那封《给任哲中的一封信》，就发表于此，任老兄看后有点意见曾找过他，他心平气和予以排解：“这没啥说！”任老也就释然了。后来他调任《西安晚报》副总编辑，官升了风格依旧，竟破格在副刊上发了我一组小文章，每次我送稿子，他总是说：“写泼辣点儿！”可惜我缩头缩脑惯了，总泼辣不起来，惹得他一说再说，直到他不幸英年早逝，我都未能写出让他满意的东西，抱憾愧疚外，我深深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文坛长兄。

曾经在编辑部工作的戏剧评论家王振伟老弟，对我更不见外，前边提到的那篇写苏育民的文章，本不是给《当代戏剧》的，但他见了，执意要留下来并交幼韩先生审阅，随之刊出。为写这篇评论性、纪念性的文字，我先后和好几位知情者谈过，既有苏家的大师兄名小生李益中，与苏家年岁相近的名小生张新华，曾担任三意社音乐设计的魏钧，以及长期和苏家同台的学生辈如严辅中（生角）、王辅生（丑角）、杨辅禄（鼓师）、胡辅胜（杂角）等。文章发表后，胡辅胜老兄曾找过王振伟，认为他曾经提供过不少材料，应当提到他，振伟当即表示：“这是文颖的不对，我转告他并代他向你道歉。”看看，是非分明，言简意赅，面面俱到，滴水不露，这就叫“哥们儿”。这件事提醒我，采写中一定要注意尊重别人的劳动，肯定别人的贡献，后来三意社搞演艺活动105年庆典出纪念文集，收了这一篇，我借此机会，特意在末尾加了“括号”，补写了我访谈过的所有真知者的大名，总算弥补了疏漏缺失，同时也给自己往后的采写立下了规矩。我尤其要感谢振伟的是，多亏他截留发表了这篇文章，否则，对这位空前绝后的秦腔巨子表演艺术的评价探究，有可能成为空白，尽管我之所写不深不透，但有总比没有要好些，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留下一份见证。诚如年届八旬的秦腔识家杨天基兄所感

慨：“有人跟苏育民合作共事多年，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文颖所写，亲历亲见，知根知底，起码可靠。”半年前，承陕西省地方志刘迈先生督促，我勉为其难写了篇似诗非诗或可视之为“铭文”的韵语，结尾几句是——20世纪，百年一人；悠悠秦腔，圣像一尊。再次表达我对这位遭逢劫难遽然陨落的秦腔巨星的尊崇与缅怀，当然更期望得到陕西父老乡亲及情系秦腔志士仁人的衷心认同。

现已退休离任的王晓玲主编，调任的雒社扬副主编，以及新接任的编辑部主任李明琰女士，他（她）们还联手成全了我一件自认为很要紧的事。2005年初夏，我接到省剧协通知并收到新出版的《中国秦腔》一书，因为通知上说近日要座谈讨论，我当即静心捧读。不过读着读着却感到不大对劲儿，因为书中的不确之处着实不少。作为老陕和老秦腔迷，我不能视而不见，我认为这本书的成败得失绝非仅仅关乎某个人，而是关乎着陕西，关乎着整个秦腔。于是，我写了《〈中国秦腔〉粗读散记》，约两万余字，编辑部经过斟酌磋商，给了我5000字的篇幅节选了几个段落，以《〈中国秦腔〉读感》刊出。在此之前，刊物还发了上海名家蒋星煜先生的评价文章，加上我这篇，至少可以传达一些不同声气，特别写秦腔的书，还是辞书性大著，陕西人不能没有态度。《读感》刊登后，我十分意外地听到一个信息，供职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学人刘畅，曾给陕西广播电视台戏曲频道女主播袁博打电话表示：“你读《中国秦腔》，一定要先看看《当代戏剧》上的《读感》，以兹参照。”这当然是相当理想的社会效应和学术效应，尽管至今关于这部书的研讨会还未开，但关心秦腔的人们，却并非无动于衷，我听到的议论就不少。窃以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声音，应该是大好事，我因而特别激赏《当代戏剧》的大气和包容。最近我还看到《当代戏剧》上两篇文章，一为《西秦腔≠秦腔》（王正强），一为《阿宫腔之我见》（曾长安），都直言不讳，兼有学术含量，颇堪一读。顺便我还想推荐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内刊《艺术界》2007年第2期仲居善先生的《试探“戏”字音衍所引发的舛误》一文，也是值得注意的佳作。因为陕西以及大西北，有丰富而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土特产”，许多现象人们显然并不明晰，以至于以讹传讹，《当代戏剧》理应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地搭建提供这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戏剧艺术平台，这是愚最为赞赏的，也是最为期盼的，《当代戏剧》既然无愧于“当代”，便理所当然地惠及于后世，这是愚对它的衷心祝愿。■